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纪念文集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编

科学出版社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纪念文集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编

科学出版社

2000

内 容 简 介

本论文集为纪念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恢复建制 20 周年而编辑出版,收集了在或曾在考古部工作过的人员撰写的考古学论文 29 篇,是考古部 20 年学术成果的展示和总结。对于推动我国考古学在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古代遗迹遗物研究、水下、航空考古研究、考古技术研究等诸学术课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读者对象为从事考古与文物研究的专业人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纪念文集/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ISBN 7-03-008048-3

I. 中… II. 中… III. 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6654 号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新 蕾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2000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9 1/2 插页:8

印数:1—2 000 字数:446 000

定 价: 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新欣))

2000. 6. 12

考古书店

**COLLECTED ESSAYS BY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

Compiled by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

Scince Press

2000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纪念文集》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孙机	李作智	佟伟华	杨林	张威
张素琳	信立祥	雷生霖	戴向明	

恢复建制后的考古部人员名单
(1979~1999)

离退休人员:李石英 杜耀西 李作智 齐虹 孙机
李文杰 李知宴 李先登 李锡经 郭仁
(10人)

调出人员:胡德平 俞伟超 易苏昊 张延平 刘本安
屈盛瑞 曹兵武 于文荣 王晓田 荣欣
苏元海 沈勇 董琦 袁虹 魏江
许兵
(16人)

部在职人员:信立祥 佟伟华 张素琳 张威 杨林
甄秀鸣 徐为群 王睿 许志勇 陈斌
张广如 戴向明 雷生霖 徐海滨 李滨
赵嘉斌 孙键 鄂杰 张帆 王月前
(20人)

共计 46 人

考古部恢复建制的前前后后

(代 序)

李石英 胡德平

在此跨世纪的年度里,考古部的同志们满怀激情地编写了这本论文集,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恢复建制二十周年的一份献礼。

中国历史博物馆自1912年筹建到建国前,始终没有设立过考古机构。但由于历史博物馆的性质和考古工作有着不解之缘,故于1921年和1924年曾派袁善元等人,先后到河北巨鹿和河南信阳做过两次考古调查、发掘工作。

自建国后至50年代中期,由于历史博物馆的工作重点,是用马列主义为指导安排陈列和文物的收集保管,尚无暇设立考古机构。但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协助文化部文物局进行重点地区的文物考古调查,或与地方合作进行考古发掘,越来越成为历史博物馆经常性的工作。参加人员一般从我馆陈列部、保管部和群工部的业务人员中临时抽调。

为了正常开展考古工作,1956年经文化部文物局批准,历史博物馆组建了考古部。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同志,对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考古部相当重视,指令文物处处长陈滋德兼任考古部主任,佟柱臣先生任副主任。但至1959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考古部被撤销。

1960年迁至新馆后,经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批准,中国历史博物馆重新成立了考古部,由李遇寅同志担任主任。当时考古部的业务人员,最多时也只有六七人。主要任务,一是协助文化部文物局进行重点遗址的调查和文物保护工作,二是协助各省文物部门培训文物干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工作又陷于全面停顿。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全国的考古工作逐步恢复。1973年,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振亚和保管部胡德平等人前往原西德访问,了解到在原西德的一些小博物馆内都开展有考古业务工作。回国之后,杨馆长和王冶秋局长谈到:“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历史这么悠

久,文物古迹又那么丰富,而国家级的考古研究机构只有一个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这和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太不相适应了。”王冶秋局长同意这个意见,并提出国家文物局系统应在历史博物馆内,建立一支像样的考古队伍,让中国历史博物馆考虑重新恢复考古部建制的问题。最后,在历史博物馆的馆务会上决定,由保管部主任李石英负责考古部的重建工作。很快,李石英执笔完成的《关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恢复考古部建制的报告》上报到国家文物局。1979年2月28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我馆,同意恢复考古部建制,并批准给考古部40人的编制名额。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恢复考古部建制的准备工作早已在进行。1975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经过当时保管部负责人李石英、胡德平二位同志的努力,先在保管部成立了一个文物考古征集组,由杨文和任组长,最初的成员只有我馆业务人员李锡经、陈斌、王晓田、于文荣、董琦等人。接着,又从外地调进一些业务人员。在调人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调进干部的入京户口指标问题。在当时还无法马上解决的情况下,即采用借调的办法,先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借调李作智同志来馆工作(至1978年初才正式调来馆内),接着又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调入有商周考古研究专长的李先登同志。1979年,考古部正式从保管部文物考古征集组分离出来,由李石英、胡德平二位同志任正、副主任,主持考古部的日常工作。对刚刚恢复建制的考古部来说,除了开展日益繁重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学术研究之外,继续扩大和充实业务力量无疑是当务之急。由于当时全国各地的文物考古工作,正在配合文物外交而轰轰烈烈地开展,从任何地方抽调一名考古业务干部,都是很难办到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李石英、胡德平和考古部秘书齐虹等同志在当时国家文物局沈竹、黄景略、谢辰生等领导同志和杨振亚馆长的支持下,到处奔走,克服了重重困难和阻力,陆续从各地为考古部调进一批业务骨干。如著名的文物专家孙机、陶瓷专家李知宴和郭仁等,就是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等单位调进的。此后不久,又设法从山西调来张素琳、屈盛瑞,从北大争取分配进大学生和研究生张威、荣欣、许志勇、信立祥、佟伟华等同志。当时考古部根据田野考古工作的需要以及同志们的业务专长,设立了商周秦汉与隋唐宋元两个研究小组。至1984年9月杜耀西同志接任考古部主任后,我馆又从北大调来了著名的考古学家俞伟超教授到考古部工作。在此十来年的期间里,就这样经过与各单位的协商和大量的人事调动工作,才铢积寸累,为考古部业务干部队伍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自1987年俞伟超同志担任馆长之后,他对考古部的业务干部队伍建设更加关怀。不仅又陆续从各高等院校分配进一批研究生和大学生,同时还派专业人

员到国外进修学习水下考古、航空考古和日本考古等。并对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要有自己的特点,要走自己的道路,田野考古要学习国际上先进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开展多学科综合考古发掘和研究,探索古人类文化和周围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俞伟超同志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努力下,考古部分别在 1987 年和 1994 年,组建了水下考古研究室(中心)和航空摄影考古研究室(中心)。目前,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在职的业务人员已有 20 人,其中有研究员 2 人、副研究员 5 人,馆员 9 人,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 75%,是历史博物馆学历较高的业务部门。现在考古部下设四个研究室,即田野考古研究室、水下考古研究室(中心)、航空摄影考古研究室(中心)和档案资料室。其中的水下考古研究室(中心)和航空摄影考古研究室(中心),是目前我国唯一的高科技考古研究机构。

20 年来,考古部的业务工作,在全体业务人员的艰苦努力下,已在田野考古、水下考古和航空摄影考古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可喜成绩。并出版了专著 35 部、发表了学术论文 525 篇。编写和出版这本论文集,只是想以考古部 20 年来所取得成绩的点滴,永志纪念。21 世纪即将来临,我们相信,考古部的同志们将会在新的世纪里付出更大的努力,以丰硕的科研成果,为祖国的考古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目 录

考古部二十年工作回顾·····	考古部部委会(1)
科学的预见——贾兰坡教授与中国旧石器考古学·····	杜耀西(13)
应当为“新石器时代”正名——兼论“陶器时代”·····	李作智(17)
关于古城东关早期文化遗存的若干相关问题·····	许志勇(26)
环境与仰韶文化·····	张广如(34)
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制陶技术·····	李文杰(41)
鄂西屈家岭文化遗存的分期与研究·····	王晓田(58)
浅谈山西庙底沟二期文化及相关问题·····	张素琳(71)
试论山西垣曲盆地龙山文化遗存的年代与分期·····	佟伟华(82)
论菜园遗存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陈 斌(95)
鸭绿江右岸地区新石器遗存研究·····	王月前(107)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夏文化·····	李先登(127)
虞夏时期的中原·····	董 琦(132)
对于垣曲商城的一些认识·····	张 帆(140)
关于青铜器窖藏性质的反思·····	王 睿(144)
关于楚文化形成、发展和消亡过程的新认识·····	俞伟超(153)
论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出土的短茎曲刃青铜短剑·····	朱凤瀚(162)
论汉代的墓上祠堂及其画像·····	信立祥(180)
佛像的火焰肩和火焰背光·····	孙 机(206)
论新加坡出土的中国瓷器·····	李知宴(217)
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出土宋代钧瓷·····	于文荣(229)
试论宋代海外贸易的弊端·····	孙 键 赵嘉斌(236)
概说水下考古理论与实践的几个问题·····	张 威(245)
内蒙古东部地区古代大型遗址航空摄影考古勘察的初步收获 ·····	杨 林 雷生霖 徐为群(255)
西方考古学观念的演变·····	戴向明(269)
考古调查与区域研究·····	曹兵武(280)
呼唤全民族的文物保护意识 正确处理市场经济与文物流通的关系·····	屈盛瑞(287)
田野考古摄影方法与实践·····	李 滨 徐海滨 鄂 杰(291)
为考古学服务的数字化图书馆·····	甄秀鸣(296)

考古部二十年工作回顾

考古部部委会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1979 年恢复建制时,只有田野考古的奴隶社会组和封建社会组,经过 20 年的发展建设,现已成为下设两个研究室和两个研究中心,具有进行田野、水下、航空摄影考古能力的科研部门。20 年来,考古部一直将专业队伍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在现有的 20 名业务人员中,有研究员 2 人,副研究员 5 人,馆员 9 人,75% 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博士 1 人,硕士 5 人,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学历较高的部门。自恢复建制以来,在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领导的正确领导和全馆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考古部围绕考古学重大学术研究课题,配合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在文物考古专题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 田野考古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满城汉墓等重大考古发现的带动下和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考古工作逐步恢复。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考古工作的需要,1975 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经过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李石英主任和胡德平副主任的努力,在保管部成立了考古征集组(以下简称考古组),这成为考古部恢复建制的基础。

从 1976 年起,为了探索夏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考古组先后在新疆、山西、河南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

1976 年 4~9 月,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邀请,考古组派李作智、张承志赴新疆,与新疆博物馆合作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查了北疆伊犁地区伊宁市花果山墓地、察布查尔县海努克古城、伊宁吐鲁番圩子唐代遗址、霍城县开元沟元代遗址、惠远城和伊犁将军府等,并在北疆的昭苏夏台发掘了汉代乌孙墓葬 28 座、塞种人石圈墓 10 座、唐代突厥族石人墓 3 座。此外,二人还专程赴松柏山边防站对格登山进行了调查,拓制了乾隆二十二年平定准噶尔叛乱的记功碑拓本。这次调查发掘所获资料,对于研究我国西北古代民族关系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976 年,考古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西省文管会联合组成考古队,共同发掘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王晓田为副队长。该遗址内含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东下冯类型文化、商文化等不同时期的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是年代为夏末商初的东下冯类型文化。东下冯遗址地处传说中的“夏墟”范围之内,它的发现和发掘对于探索夏文化和研究早商文化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976~1979 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先后有考古组(部)的李锡经、王晓

田、胡德平、于文荣、董琦、陈斌、易苏昊及陈列部、保管部、群工部的 20 余人参加了发掘。在发掘中,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人员发现了夏文化的“回”字形沟槽建筑、窑洞居址及陶窑、商代二里岗期的大面积圆形夯土建筑群,为夏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从 1980 年起,王晓田作为执笔人之一参加了发掘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的编写。1989 年,发掘报告《夏县东下冯》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77 年,考古组与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合作,对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和东周阳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至 1981 年发掘结束,中国历史博物馆先后有考古组(部)的李先登、董琦、杨文和、张承志、易苏昊等人参加了发掘。该遗址内涵丰富,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经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代二里岗文化、西周文化、东周文化、直至汉唐文化。其中以王城岗龙山文化和东周阳城内外的战国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和重要。在这次发掘中,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夯土城址以及陶器上的刻划文字,为探索夏文化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1981~1983 年,李先登、董琦等人参加了发掘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编写。1992 年,发掘报告《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79 年 2 月考古部恢复建制后,不仅继续进行了考古组还未完成的各项工作,而且组成新的考古队,开辟了许多新的考古工地。

1979 年 7 月,考古部派李锡经、陈斌赴山西,与运城地区文化局合作组成考古队,由李锡经任队长,在万荣、稷山进行了考古调查。当年 9 月,在李锡经主持下,对调查中发现的万荣县西解遗址进行了试掘。该遗址是一处保存良好、面积达 10000 余平方米的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出的大量陶器具有早期仰韶文化特征,但器形和纹饰仍与老官台文化和磁山·裴李岗文化有很多接近之处,证明这处遗存是老官台文化、磁山·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的一种过渡类型。1989 年,由陈斌执笔的《万荣西解遗存的发现及其在仰韶文化中的位置》一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发表。1997 年,由陈斌执笔的《万荣等四县考古调查和发掘》一文发表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 年第 1 期。

1979 年,考古部派李作智、李知宴、于文荣等人与浙江省考古所、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派出人员共同组成聚水滩工程考古队,对龙泉窑东区窑址进行了调查发掘。在李作智主持下,考古部人员调查发掘了上严儿村窑址,揭露出南宋晚期至元代中期的窑址 5 座。通过这次发掘,搞清了该区制瓷业的生产规模和发展状况,获得了一批分期断代的重要资料,从而对龙泉窑青瓷从南宋晚期至元代的生产和技术工艺,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特别是上严儿村窑区的一些产品,与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的部分瓷器完全一样,证明该区产品相当一部分是外销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 8 期发表了这次考古发掘报告——《浙江龙泉青瓷上严儿村窑址发掘报告》。

1982 年秋,考古部主任李石英带领李作智、李知宴、屈盛瑞、陈斌等人赴山西省雁北地区进行调查。自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5 日,先后调查了山阴、代县、五台、浑源、应县、怀仁等六个县,行程 1300 公里,共调查古遗址、古墓群、古建筑 31 处。在山阴,调查了故驿古城、阴馆城、广武汉墓群、辽代和明代的雁门关以及新、旧广武城;在浑源县,调查了瓷窑沟的辽、金时期瓷窑遗址,考察了悬空寺;在应县,调查了繁峙古城、镇子梁古生物化石出土地点、镇子梁遗址以及辽代木塔;在怀仁,调查了日中城及古墓群、早起城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在代县,调查了李克用墓、汉代广武城址等。通过这次调查,大致搞清了雁北地区六县的文物分布,

为考古部在雁北地区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为了探索夏文化的新线索,1984年,考古部派李先登先后对河南新乡、濮阳、商丘以及山东菏泽、安徽亳州等地区的数十处龙山至夏商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在此基础上,1985年考古部与新乡地区文管会、济源县文保所合作,由李先登任考古队长,对济源县苗店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1990年,发表了发掘简报。

1984~1991年,杜耀西任考古部主任期间,考古部的建设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上任伊始,杜耀西就深入到考古部的山西垣曲和平朔发掘工地,了解工地情况,协调历博和当地文物部门的关系,解决考古部参加发掘人员的具体困难。为了与宁夏文物考古所合作发掘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群,杜耀西亲赴宁夏进行协商,促使双方签订了合作发掘协议书。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为考古部制定了科研规划。在他和大家的努力下,考古部的各项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这一时期,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主动考古发掘也频繁展开。

1986~1988年,考古部与宁夏文物考古所合作,对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群进行了发掘。菜园村遗址群由七处遗址组成,其中三处为聚落遗址,四处为墓葬群。发掘揭露面积7100平方米,清理出房屋居址、灰坑、窖穴、窑址、墓葬等遗迹200余座,出土各类遗物达10000余件。发掘结果表明,这些遗址均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从年代和出土陶器特点看,文化性质与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相当,但又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应属马家窑文化变种。发掘资料说明当时这里的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家畜驯养为辅、兼营捕捞业的生活,纺织业较为发达。菜园遗址群的发掘首次揭示了宁夏南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基本面貌,对探讨与临近地区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考古部郭仁、李文杰、陈斌、董琦、于文荣和李滨参加了调查、发掘。陈斌作为执笔人之一的发掘报告,目前正在编写之中。

随着业务队伍的发展壮大,考古部配合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进行了多次重要考古调查和发掘。

1982年,中美合资的山西省平朔露天煤矿在建设职工生活区时,于朔州市朔城区城北发现了一处规模庞大的战国墓群。1983年3月,考古部受国家文物局黄景略处长委托,派信立祥、屈盛瑞、荣欣等人和国家文物局的杨林一起赴山西,与山西省考古所、雁北地区文物工作站、大同博物馆等单位的近70名考古业务人员共同组成平朔考古队,对平朔古墓群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杨林、信立祥任平朔考古队负责业务工作的副队长。截止到1987年,在朔城区北的平朔露天煤矿生活区和平鲁区城东的平朔露天煤矿矿区,先后发掘了战国、秦、汉至辽、金的古墓葬近3000座,出土文物20000余件,不少文物曾参加过国内外的文物展览,其中3件文物选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这批墓葬,特别是平朔露天煤矿生活区的战国、秦、汉墓群,分布密集,排列有序,时间连续,随葬品组合系列清楚,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是研究长城沿线地带秦汉墓葬考古的系统而典型的资料。发掘资料表明,马邑作为秦汉时期抗击匈奴的北方军事重镇,始建于秦代,到西汉中期达到极盛,其原址应就在今朔州市朔城区范围内;当地的丧葬礼制从建城始就受到秦文化的强烈影响,而与三晋的丧葬礼俗迥然有别,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西汉中期才被新的汉代丧葬礼制所代替。在发掘过程中,信立祥、屈盛瑞承担了主要大型木椁墓的发掘任务。受雁北文物工作站的委托,信立祥还承担了为其培训考古业务干部的任务。1987年,由信立祥主持、屈盛瑞和山西省业务人员参加整

理和编写的《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在《文物》上发表,为长城沿线地区的秦汉墓葬考古建立了断代标尺。目前,由信立祥等人参加整理编写的平朔秦汉墓大型发掘报告正在编写之中。

为了配合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建设,受国家文物局委托,考古部王晓田参加并主持了西陵峡内的朝天嘴、中堡岛、下岸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经过发掘,证实朝天嘴遗存早于大溪文化,并在中堡岛遗址中发现了商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的地层关系。从1987年起,王晓田作为主要执笔人,参加了西陵峡各遗址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发掘报告《朝天嘴与中堡岛》一书的编写。现该书已经定稿交出版社出版。

为了抢救和保护三峡水利工程淹没区的文物,1997年6月,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受重庆市文化局委托,承担了发掘云阳县“故陵楚墓”的勘探与发掘任务。发掘前,曾对帽盒岭进行了遥感探测和地面钻探,证明分布着密集的古墓葬。1998年2~6月,1999年3~5月,在四川大学马继贤教授的主持下,对帽盒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共开掘探沟、探方14个(条),揭露面积1500余平方米,发现和清理了战国至唐代的墓葬24座,其中的两汉墓葬数量较多,时间从早到晚比较完整,对三峡地区两汉墓葬的分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通过发掘,否定了《水经注》的记载,证明帽盒岭仅是一座自然山丘,并非早期楚陵。考古部遥感和航空摄影研究中心的杨林、雷生霖以及重庆市博物馆、云阳县文管所、奉节县博物馆、洛阳市文物队的考古人员参加了发掘。

上述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都是考古部与其他兄弟单位合作,由兄弟单位业务人员担任领队来进行的。而实际上,80年代初期,考古部就已经开始由自己的业务人员担任领队、主要依靠自己的业务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和发掘,这是考古部恢复建制后的第一个飞跃。

晋南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为了探讨考古学上的夏文化问题,考古部决定在晋南地区选点进行考古发掘。1982年春,由郭仁带队,考古部的张素琳、张威和垣曲县博物馆的吕辑书等人参加,在山西省垣曲县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古调查,最后选定古城东关遗址作为发掘地点。当年秋季,考古部与山西省考古所、垣曲县博物馆合作进行了试掘,了解到这是一处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内涵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龙山文化及东周文化遗存的一处重要遗址。1983~1986年,在郭仁和佟伟华的先后主持下,考古部垣曲考古队对这处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近3000平方米,发现了各时期的灰坑、房屋居址、窖穴、墓葬等众多遗迹,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考古部张素琳、张威、许志勇、易苏昊、魏江、张延平及陈列部和山西省考古所的一些业务人员参加了发掘。这是晋南地区仅有的几个经过大规模发掘的重要遗址之一。这一发掘,为探讨晋南地区原始文化的发展序列、文化特征及其与邻近地区古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学术资料。这是考古部第一次以本部门为主承担和主持的大型考古发掘项目,它标志着考古部的专业队伍建设已进入成熟阶段。目前,由佟伟华主持,张素琳、许志勇参加的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1984年,考古部垣曲考古队在当地文化部门协助下,在垣曲县古城镇南关发现了一处商城遗址。1985年春,以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人员为主,与山西省考古所人员联合组成垣曲商城考古队,由佟伟华任领队,开始对这处商城进行全面勘察和试掘。考古部张威、张素琳、许志勇参加了勘察和试掘。通过试掘,初步搞清了城址的范围、内涵、建造和使用时

代,判明了这是一处商代二里岗期的城址。城垣大体呈方形,南北长 400 米,东西长 350 米,总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宫殿区位于城内中部偏东,已探明有长方形和曲尺形的大型夯土建筑台基 6 处。城内东南部为一般居民居住区,发现了房屋居址、陶窑、窖穴、墓葬等遗迹。这是目前继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之后所发现的第五座商代前期城址。1996 年,由佟伟华整理了 1985~1986 年的勘察、试掘资料,执笔编写的勘察试掘报告《垣曲商城》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自 1987 年以来,在佟伟华、董琦和戴向明的先后主持下,垣曲商城考古队连续多年对这处商城遗址进行了大面积揭露发掘,迄今总发掘面积已达 10000 余平方米。至 1992 年秋,解剖了四面城墙,揭露了五号夯土台基。在勘察和发掘的基础上,考古队在俞伟超馆长的帮助下,制定了长期工作规划,计划在 8~10 年内对城址进行全面揭露。为了搞清商城的布局,从 1993 年起,首先发掘了西城门及其附近的一段城墙、城墙外的护城壕,发现了两条并行的、从西城门向东延伸到宫殿区的大路沟。为了搞清两条路沟与城内布局的关系,考古队对两条路沟特别是路沟与宫殿区的交汇部分进行了揭露性发掘。通过发掘,证明两条路沟和西城墙外的城壕原来都是自然冲沟,早在二里头晚期就已经形成,并由这三条自然冲沟共同构成了一个二里头文化晚期的环境聚落;到二里头下层时期,城始建,利用了南北向冲沟作为西城墙外的护城壕,而将两条东西向冲沟填起大半,作为城内贯通东西的大路使用。在宫殿区的西侧,有一道总长度 70 米以上的南北向宫墙。在夯土墙东侧的宫殿区西半部,揭露出南、北两座夯土台基。台基宫殿建于二里头下层、毁于二里头上层时期。垣曲商城的发掘,对于探讨我国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研究商代前期的社会史、物质文化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考古部先后有李滨、沈勇、曹兵武、袁虹、王睿、张帆等以及陈列部、科技部的一些业务人员参加了发掘。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库工程建设的加快和库区淹没期的临近,垣曲商城的发掘正在紧张进行之中。

多学科综合性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是当前国际考古学界的发展趋势。在俞伟超馆长的指导下,考古部从 80 年代末开始,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性实践。

1988 年秋,考古部派刘本安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周昆叔教授一起,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环境考古调查,对距今 7000~4000 年前的 21 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貌环境进行了考察研究。接着,考古部同中国科学院地质所签定了联合进行环境考古研究工作的协议书,决定由考古部提供经费,继续对黄河中游地区进行环境考古的调查研究。1989 年秋,考古部的张广如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安黄土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共同组成环境考古调查组。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调查组行程万余公里,先后调查了关中渭河两岸的全新世黄土地层、文化遗址同地貌的关系、文化层与地层的关系。通过对所采集的 200 余个碳十四、热释光、古土壤、孢粉、物理、化学等样品的分析和研究,对关中地区全新世周原黄土沉积序列有了基本了解,搞清了关中褐红土或红褐色顶层埋藏土是在比该区现在更为温暖而潮湿的环境下形成的,该层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秦汉文化层是同期的,说明当时的古气候、古环境为关中华夏文明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对顶层埋藏土和顶层黄土的深入研究,为该区环境考古提供了丰富信息,对考古学无疑有着重大意义,同时也为班村遗址多学科综合发掘与研究做了准备。

为了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库工程建设和以新的成果纪念“仰韶文化”发现 70 周年,在俞伟超馆长的支持和组织下,1991 年 4 月,考古部的张广如、曹兵武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

周昆叔、湖南考古研究所的裴安平一起,对小浪底水库库区进行了考古与环境考古踏勘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考古部决定对河南省渑池县班村遗址进行多学科综合发掘与研究。班村遗址位于黄河南岸,总面积约 30000 平方米,内含多种文化层。由于该遗址具有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对于研究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多得理想遗址。当年 10 月,考古部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召开了“小浪底水库班村遗址综合发掘与研究论证规划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博物馆和渑池县文管会等单位的考古、古地质、环境考古、文化人类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以及物理、化学方面的专家和业务人员 30 余人,美国著名考古学家沃尔森教授和艾金斯教授也应邀出席了会议。在俞伟超馆长的主持下,会议审查并通过了各学科的工作方案,决定成立班村遗址综合发掘与研究考古工作队,由俞伟超任总队长,信立祥任副总队长兼考古组组长,同时推选出顾问组。根据会议决议,从 1992 年春季起,各学科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考古组先后在信立祥和西北大学王建新的主持下,对班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至 1999 年夏季,共发掘揭露了 7500 平方米,基本搞清了遗址的内涵和聚落布局。遗址包括裴李岗、庙底沟一期、庙底沟二期、东周和宋元文化层。发掘资料表明,裴李岗时期人类开始在这处遗址上居住和生活,当时的人们过着季节性迁徙的捕捞、狩猎生活,农业还不太发达,大量的烧烤坑应就是当时人们烧烤鱼兽留下的遗迹。到了庙底沟一期文化时期,人们在这里建起了完整的聚落,遗址东部一条深达 8 米的南北向自然冲沟作为聚落的东界,冲沟西部为居住区、东部为墓葬区,过着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和捕捞的定居生活,死后埋葬在聚落东部的氏族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这里的聚落规划更加完善,明确地分为居住区、窖藏区、祭祀区和墓葬区,大量内储粟米的窖穴证明,当时的锄耕农业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战国中晚期的墓葬和宫殿址表明,这里是韩国据守黄河南岸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在考古队的统一安排和组织下,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组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成果证明,距今 7000~5000 年前,班村遗址周围气候温暖,雨量充沛,遍地生长着亚热带植被,平均年气温比现在高 2 度左右,自然条件与现在的长江以南地区相近,是一个最适于人类生活和发展农业的时期。遗址中裴李岗文化、庙底沟一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原始锄耕农业的发达,与这一时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着直接关系。当时班村遗址周围的动物群除了野猪和鹿之外,还生活着竹鼠等相当数量的亚热带动物,生活在遗址中的人们除了农业和采集外,主要以猎取这些动物和捕捞黄河或涧河中的鱼类为生;而随着原始锄耕农业的发展,狩猎和捕捞在经济生活中的比例逐步下降,说明定居的农业经济已经逐步占了主导地位,粟是当时种植的主要作物;遗址周围古地貌 7000 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黄河及其两条支流的洪水作用下,原遗址北部和西部已经被完全切削冲毁,现存遗址不过是当时遗址的南端一部分,原遗址的中心部分已经不存,对遗址及遗址周围地貌改变最大的是发生在距今 4300~4000 年前的一次巨大洪水。各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结果,对解释班村遗址及生活在遗址上古人类集团生活方式的变迁提出了令人确信不移的证据,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一种极为有益的尝试和成功范例。在班村考古队工作期间,美国的沃尔森、艾金斯、英国的霍立志、日本的茂木雅博等外国学术顾问曾多次到工地指导工作,就发掘和提取信息资料方法与考古队进行交流,并做了实地演示。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吉姆参加

了发掘。目前,班村遗址的田野发掘和考察已经结束,发掘报告已经完成初稿,预计2000年初即可交出版社出版。

山西垣曲东关遗址、商城遗址和河南浍池班村遗址的发掘,表明考古部已经具备了独立承担大规模发掘的能力和技术力量。

二 水下考古

水下考古学是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一门新兴考古学科。由于水下考古学技术复杂、耗资巨大,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起步很晚。1986年,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盗捞出大量清代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并将部分瓷器运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拍卖,一次获利达2000万美元。这一事件引起了我国政府和文物管理部门的极大关注,我国考古界、博物馆界也强烈要求建立我国自己的水下考古学队伍,开展水下考古工作。1986年9月,国家科委和文化部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强我国水下考古工作的报告》,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报告做了重要批示。1987年2月,文化部发出《关于筹建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的通知》。3月13日,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制定了我国水下考古的工作规划。1987年11月,在俞伟超馆长的大力支持和直接领导下,中国第一个水下考古学研究机构——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在考古部成立,由考古部副主任张威任中心主任。

为了建立我国自己的水下考古专业队伍,水下考古研究中心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方针,积极争取与先进国家的水下考古界合作。为此,国家文物局先后派张威等人赴美国、荷兰、日本学习进修,了解并掌握国际上水下考古的知识和动态。同时,多次邀请国外著名水下考古学家来华讲授水下考古的理论和基本方法。1989年,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日本水中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的南海一号宋元沉船的调查,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物考古界与国外研究机构的第一次合作。1988年12月,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培训中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和合作开展水下考古研究工作的意向书。1989年9~12月,中澳合作在青岛举办了水下考古专业人员训练班。澳方专家对水下考古研究室、沿海各省和厦门大学的11名学员进行了潜水、水下考古学理论、水下考古调查发掘技术、水下绘图和摄影、计算机等项技术进行了培训。1990年3~5月,培训班全体人员到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进行实习。在澳方专家指导下,对定海村海域的几处沉船遗址进行了勘察,并选定白礁遗址为工作重点,进行了海底地形测量、遗址表面采集、探沟试掘等一系列工作。参加培训的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业务人员张威、刘本安、徐海滨、李滨四人均以优异成绩结业。通过这次培训,学员们比较系统地掌握了水下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技术,可以说,新中国第一支水下考古专业队伍已经建立起来了。

随着水下考古专业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成熟,10余年来,水下考古研究中心采取以自己力量为主,与经过培训的各省水下考古力量联合工作的方针,在我国广阔的海域和江河湖泊进行了多次水下考古勘察和发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古代沉船遗址的勘察和发掘是水下考古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一直将古代沉船遗址的调查、发掘作为主要工作任务。如1990年6月对海南省文昌县宝陵港